



国防经济学系列丛书

精品译库

总主编 / 翟钢 陈波

战争与和平 经济理论

[法] 范妮·库仑 著
Fanny Coulomb

陈波 阎梁 主译



**conomic Theories of
Peace and War**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国防经济学系列丛书·精品译库

总主编 翟钢 陈波

战争与和平 经济理论

[法] 范妮·库仑 著
Fanny Coulomb

陈波 阎梁 主译

Economic Theories of
Peace and War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争与和平经济理论 / [法] 范妮·库仑 (Fanny Coulomb) 著;
陈波, 阎梁主译.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12

(国防经济学系列丛书. 精品译库)

ISBN 978 - 7 - 5058 - 9761 - 8

I. ①战… II. ①库…②陈…③阎… III. ①国防经
济 - 经济理论 IV. ①E0 - 0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9481 号

责任编辑: 侯加恒 王晶晶等

责任校对: 张长松 韩 宇

版式设计: 代小卫

技术编辑: 王世伟

战争与和平经济理论

[法] 范妮·库仑 (Fanny Coulomb) 著

陈 波 阎 梁 主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辑部电话: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88191540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北京三木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87 × 1092 16 开 21 印张 400000 字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58 - 9761 - 8 定价: 39.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国防经济学起于战争实践，又与人类的和平与发展息息相关，这些年取得了飞速发展。为全面、系统反映国防经济学发展全貌与演进，总结挖掘国防经济实践成果，展示现代国防经济学发展方向，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国防经济学系列丛书》。

《国防经济学系列丛书》包括四个子系列：（1）国防经济学核心教材；（2）国防经济学学术文库；（3）国防经济学精品译库；（4）国防经济学博士文库。重点展示国防经济学领域学者在一般性基础理论和方法研究、国家战略层面对策研究，以及面向现实的重大应用研究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丛书选题涵盖经济与安全、战略与政治、国防与和平经济、国防财政、国防工业、国防采办、国民经济动员等相关领域，既包括国防经济学领域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介绍，如《国防经济学》、《国防经济思想史》等；也包括对一些国家或领域国防经济情况的专门介绍，如《美国国防预算》、《国防财政学》等；还包括对国际国防经济学领域研究最新发展情况的介绍，如《国防经济学前沿专题》、《冲突经济学原理》等。

《国防经济学系列丛书》瞄准本领域前沿研究领域，秉承兼容并蓄之态度，建立开放性运行机制，不断补充新的选题，努力推出中国一流国防经济学者在本领域的教学、科研成果，



并希望通过借鉴、学习国际国防经济学发展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成果,进一步推动我国国防经济学研究的现代化和规范化,力争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在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等方面使中国国防经济学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能有一个大的提升。

本套丛书由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发起筹备并组织编辑出版,该院组成了由国内外相关高校、科研机构 and 实际工作部门的一流专家学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参与编审、写作和翻译工作的除来自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政府管理学院、经济学院、财政学院等教学科研单位的一批优秀中青年学者外,还有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后勤指挥学院、军事经济学院、海军工程大学、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等国内国防经济与相关领域教学与研究重镇的一批优秀学者。经济科学出版社积极支持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剑桥大学出版社等也积极支持并参与部分图书的出版工作。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让我们携起手来,为推动中国与国防国际国防经济学界的交流、对话,为推进中国国防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的大发展而贡献我们的智慧、才华与不懈的努力!

是为序。

翟 钢 陈 波

2010年6月于北京

译者序

任何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于是，就有了历史。战争与和平的经济理论（史）反映的是战争与和平有关的经济理论、思想发生、发展和演化的历史。追寻作者的笔迹，我们仿佛看到了在经济思想史上，关于战争、和平与经济的这些天籁之音，久远而漫长……

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学都不是脱离一般社会思想的独立体系，经济学如此，战争与和平经济学亦如此。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战争与和平经济分析的种子是在遥远的古希腊——这块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就开始种下的。古希腊人用他们的激情开始为社会科学定下逻辑，那的确也是一个哲学的时代。所以是哲学家首先把战争、和平、冲突与经济问题相联系并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的。在这些哲学家的早期观念中，防卫显然比经济是更为重要的社会目标。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看来，“理想国”的最主要目标是智慧而非财富。社会有必要维持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个社会，包含士兵阶层、生产者阶层与哲学家阶层，而哲学家阶层当仁不让应当统治着整个社会。

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生活在古希腊城邦式微的年代，他认为，道德可以缓解经济问题，区分了对财富的自然使用和非自然使用，虽然从奴隶主阶级的家庭管理即他所谓的“经济”出发，没有反对以物物交换和以货币为媒介的简单商品交换，却反对以追求货币财富为目的的大商业（即“货殖”），认为“货殖”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不过，这并不影响他仍然主张社会必须有足够的财力来确保其防卫能力。认为侵略战争只能毁灭侵略方，其领土扩张从长远看是破坏



性因素。

经过长期的征战与扩张，罗马逐渐成为拉丁族诸城邦的霸主，又经过一段残酷的征战，古罗马最终成为整个地中海地区的统治者。在古罗马取代古希腊成为西方思想中心的时候，对商业的兴趣已经发展起来，至罗马共和国终结的时候，大量的贸易、金融、战争、奴隶制等问题，都需要雇用经济学家和政府顾问来解决，但遗憾的是在这个时期却很少能够看到这方面的思想问世。也许因为连年的战乱和厮杀，就文化程度讲，古罗马的奴隶甚至常常超过奴隶主，因此，在古罗马就不能象古希腊哲学家那样从自然伦理道德观上或自然观上来论证奴隶制度，而只能从法律上来论证变战俘为奴隶乃是战胜者的权利，把战争看做是发财致富的源泉是完全合法的。

从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 17 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西方社会进入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西欧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宗教神学，几乎建立了近乎柏拉图式的社会等级结构，一个人要么是农民、要么是军人、要么是牧师。牧师开始实行对学问的实际垄断，在经院哲学家看来，一切真理都已由《圣经》提出来了，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运用抽象的思维与逻辑推理的方法来论证和维护基督教的教条和教义。经院哲学严格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以致在这 1 千多年的历史里，很少能看到战争与和平经济思想的痕迹。

从 15 世纪中期开始，西欧意大利、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中世纪以农业为基本产业的封建社会逐渐衰落，以工商业为基本产业的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并艰难地、有时甚至是曲折反复地成长起来。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主流是一种被称为重商主义的思潮。重商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同时兴起。这种学说表现出实用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特征。重商主义提出各种政策建议，旨在通过战争而增加国民财富，因此战争主题充斥于该学派的研究之中。

重商主义思想的催化剂是地理大发现，后者带来了海上贸易的空前发展和南美洲的大量金银流入欧洲。这些经济巨变极大地改变了中世纪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文艺复兴鼓励追求财富和权力，并复兴工商业。重商主义理论中显然贯穿着整体战争概念，即同时包括军事、经济意义上的战争。经济发展实际上已成为增强国力的手段。西班牙的重商主义者都强调君主需要不断地积累贵金属，此举被认为是发展军事、经济权力的基础。这被称之为“重金主义”；法国重商主义者强调优先发展工业、扩大贸易并以此保证黄金的流入。不过，法国同时还禁止出口可能作为战争工具的产品（尤其是武器）并实施进口替代政策；英国的重



商主义则立足于通过贸易发展国民经济。重商主义者在发展经济与确立国力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从此以后，经济原因成为战争的借口。他们相信，国际经济关系的特点是为了获取市场和资源而进行的经济、军事竞争。国力是相对的，政府必须提高本国在国际权力等级中的地位。为此，政府必须在国际舞台上进行干预以增进国家利益。在国内，政府可以采取相应措施促进出口工业的发展。这些重商主义原则为“保护主义”、“经济战”等现代概念开辟了先河。事实上，通过为侵略性贸易政策和军事征服政策正名，重商主义者开启了对贸易干预介入时机的争论，而贸易干预主义直至今天仍然存在。

重商主义理论影响的式微以及18世纪末重农主义的兴起意味着人们思考国防与经济关系的方式发生了逆转。重农主义产生于法国。在战事频发的18世纪，法国政府系统因不当的税收制度以及过度的军队开支而饱受争议，因此重农主义者主张通过激进的经济改革来保护和拯救法国政府。重农主义的先驱布阿吉贝尔认为农业是军事力量的基础，表达了与重商主义截然不同的观点。重农主义者尊重自然法则，因此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此外，他们还认为国际贸易对国家发展的作用甚微，并建议发展农业。重农主义挑战重商主义，认为经济是国家实力的首要基础，和平是国家收入、实力增长的必要条件，也是人类进步，经济发展所必需。

二

历史上，古典主义与重商主义代表了经济史上的首次思想分裂。前者认为，经济只是政治家手中的工具。而在后者看来，市场的存在自然导致各国经济相互依赖，世界和平自然水到渠成。对重商主义者来说，政治支配经济；而古典经济学家则认为，从长远来看，经济才能确保国家稳定，政治力量会越来越弱化，而经济系统能确保世界和平。遵循这种分析思路，经济学逐渐从政治思考中解放出来，成为一门“科学”，随着新古典理论的出现，这一进程在19世纪得以完成。19世纪末，新古典经济学家建立了纯经济理论，只讨论经济机制而不考虑政治因素。不过，新古典经济学家只不过认为政府应退出市场而专注于对外政策，并没有深入分析国际关系的经济方面。而综合重商主义和古典主义的文献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是否带来国际和平已成为经济学家研究国际关系的焦点。

古典经济学家强调战争的无用性、以及战争的经济特征。在英国，亚当·斯密反对重商主义的信条，并怀有经济由“看不见的手”自然控制的信念。若干



年后，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了“萨伊定律”。该定律促使人们意识到世界和平的益处，因此被称为重大发现。这两位经济学家建立了相对乐观的自由主义流派，认为人类可以通过自由贸易实现世界和平。

萨伊试图用“萨伊定律”证明战争毫无用处并终将消失。认为政治、经济的进步最终会使各国政府确信自由贸易的优越地位。随着教育和经济规律的普及，和平观念必将传遍全世界。萨伊之后，法国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巴师夏认为，利益的驱使会使一国或者用武力霸占他国财富，或者靠生产富强自身。这就是掠夺与生产、掠夺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区别。掠夺是人类的固有本性，因此战争充斥着人类的历史。巴师夏建议欧洲国家裁军，这主要是因为：一是军费开支的减少会带来税收的降低；二是裁军会带来一场广泛的世界和平运动。在经济上，自由贸易比贸易保护主义、殖民主义更为有益。通过降低军费开支和组建民兵，可以实现从进攻性军事政策向防御战略的转变。

与其一贯的风格一致，马尔萨斯战争理论中最著名的论断是，过多的人口导致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战争通过大量减少人口而遏制了人口过多现象。但是，马尔萨斯认为这个理论仅适用于人类发展的初始阶段。在现代社会，战争调节人口的作用越来越小。于是，他的兴趣转向国际冲突。在人口论的后继版本中，他多次分析了国际冲突。马尔萨斯对战争原因的讨论也使乐观的理想主义者泄气，后者认为人类向着经济发展与和平的目标不断进步。马尔萨斯认为，人类进步根本得不偿失，而自由贸易也不能保证世界和平。不过，马尔萨斯仍然是市场经济和私人财产的热情支持者。

英国古典学派的研究通常被纳入自由贸易促进和平这一理论范式。而大卫·李嘉图提出了这一范式的基本理论框架。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贸易促进和平。然而，李嘉图的理论也具有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他认为从长期看经济发展会陷入停滞状态，而国际贸易只是在中、短期内能够缓解利润率的下降趋势。在其著作中，李嘉图大量分析了与战争和国家安全有关的经济问题。事实上，李嘉图的研究介于两种流行的经济分析之间：一种考虑国力与国家防务问题，而另一种则不考虑。李嘉图创造了国家防务、和平问题的经济学分析传统。同时，他继承了马尔萨斯的有关观点，并且悲观地认为无法实现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

詹姆斯·穆勒的著作深受李嘉图理论的影响。他关于对战争、和平和防务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认为战争总是破坏经济，而人们总是倾向于增加资本积累。国家在战时把个人储蓄的一部分用于支持战争，因此降低了战后资本



积累的能力；二是认为贸易促进农业和工业发展，带来国家的繁荣。因此，认为贸易导致国际冲突的说法有失公允。商业动机常常给政府提供了推行扩张政策的借口。穆勒谴责殖民征服。与斯密的观点相似，他认为殖民地贸易仅有利于排他性的垄断利益；三是认为随着文明的进步，现代社会不可能再受到武装入侵。“好”的政府是温和的，并只发展本国的防御能力。战略考虑不应妨碍经济政策。穆勒象李嘉图一样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即使以国家防御的名义。

小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几次提到防务问题。他同意斯密的观点，认为在特殊情况下防卫优先于经济问题。他反对不道德的侵略战争，但认为国防是合理的。因此，他支持《航海法》，以弥补英国与荷兰海军的力量差距。他和斯密都认为，《航海法》虽然在经济上不合理，但有重要的政治利益。此外，小穆勒还从道义上谴责了战争。与所有古典学派学者一样，他颂扬了贸易的开化与和平特征。除了经济收益，国际贸易的发展也能促进道德进步。贸易密切了国家之间的联系，并使各国习惯于不以窥覷心态来看待别国的财富。所以，贸易强化了各国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共同利益。穆勒批判了重商主义国家利益冲突的观念，推崇古典自由主义传统。

在这个时期，空想社会主义者首先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古典经济学家的主张进行了质疑。圣西门学派的经济学家循着创始人的思想轨迹认为世界和谐将终止战争及苦难，世界和平将随着工业社会的联合而自发地出现。奥古斯特·康德也认为人们有不断结成更大社会组织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有利于和平区域的持续扩大。

傅立叶幻想认为杰出的专制者能够提供永久和平。在他虚幻的理想社会中，资本、货币和财产得以保留，但都被整合到一个扩大参与的系统之中。然后，他又提出了人类联合的设想，并主张由开明的“君主”来统治世界。认为军事征服和政治经济上的君主统治将会拯救世界。康斯坦丁·魁尔则寄望于世界国家促进和平。魁尔认为，所有战争都不利于人类的繁荣；即使对征服者而言，战争通常都是错误考虑的结果。战争起源于私有制和剥削。为了克服经济危机和贫穷，他建议和平没收所有者的生产资料。他继承了傅立叶的思想，提议建立一个积极而节俭的军队来确保国家安全和繁荣。魁尔作为世界主义者希望加强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并主张废除国界这一国际关系中容易诱发战争的因素。

无政府主义的创立者威廉·古德温认为，战争植根于自由主义和财产权。战争在理想的社会中自然会消失。他强烈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并阐述了无政府



社会理论，即每个人根据自身需要共同工作。无政府运动后来被蒲鲁东和巴枯宁等人得以发展。

蒲鲁东的著作创造性地揭示了和平的消极一面：虚无与休止。认为没有战争的和平难以理解，它只是战争的休眠期。战争是神圣的行为，它源于贫穷并应与贫穷一起消失。蒲鲁东认为战争是成长的表现。人类生活是一场永恒的战争，是对需求、自然、他人和自身的抗争。认为战争主导了人类历史，战争与宗教一样有优先原则、有结局以及内在秩序。战争导致国家法律的显著发展，从而使人类社会达到文明阶段。蒲鲁东希望在“综合社会”，实现积极而有活力的和平。他认为，所有的政府和人民都希望和平：“人类伟大、正确，人类不再需要战争”。巴枯宁则认为自由促进和平。认为自由意味着废除历史权利、禁止永久性契约和承认退出权利，所以自由应该在国家联盟框架下在民主中发展。联盟必须反对国家渴望荣誉、伟大和力量。幻想认为欧洲国家联盟建立后，国内战争将不可能发生。

古典主义的战争与和平经济思想在受到历史学派指责的同时，也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质疑。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是根本冲突的，因此斗争处于经济的中心位置。阶级斗争可以解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内战争。马克思资本主义分析的核心是冲突、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等概念。认为政治现象作为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是由生产关系直接决定的，而生产关系又由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经济冲突发生在生产力领域，由生产关系所决定。阶级斗争因此是所有社会发展的基础。马克思还认为，生产方式具有历史连续性，从奴隶制、亚洲、古希腊、封建到资本主义，每一种生产方式都包含了使其消亡的条件：一个阶级的统治会逐渐促使一个对立的、受压迫阶级的出现，而后者会决心结束剥削并表现其自身价值。然而，促使生产方式转变的事件很少，其中革命和战争最为突出。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战争是生产关系分化的结果。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战争首先基于阶级斗争。然而，这个体系必然的发展规律在路径和时间上是可以改变的。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贸易或殖民地竞争会引起战争，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经济矛盾在国际上的表现。马克思认为，战争是资产阶级的永恒状态。从历史上看，资产阶级不但与国内其他阶级开战，还与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开战。而且，资产阶级一面向无产阶级寻求战争支持，另一方面又赋予战争“资产阶级的文化因素”以及“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战争是注定要消失的，恩格斯指出了国际冲突和军备竞



赛对无产阶级事业的负面影响，认为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和平。

三

20 世纪之后，现代经济学历经“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三次大的革命，逐渐演化成现在所谓的新古典主义。这个阶段也是经济学流派纷呈、战争与和平经济理论形成奠基的一个重要阶段。

与 18 世纪以来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相比，瓦尔拉斯的和平主义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探索。这种探索与作者试图建立如自然科学那样真正的经济科学目标的努力相关联。首先，瓦尔拉斯认为只要每个人都遵守经济科学规律，作为自由贸易条件和结果的世界和平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实现；第二，一直存有这样的矛盾：一方面人类出于长期利益考虑总是并且处处维护着自由放任原则，而另一方面，人们又不愿意通过单边废除自由贸易障碍，在国家经济安全和防务问题上做出让步。瓦尔拉斯认为在国防方面，政治真理是相对的，它因国而异、因国内国际环境而异，而且它能证明保护主义的合理性。

帕累托则以其一贯的风格在一些著作中对战争充斥的社会历史给出了决定论式的解释，这种决定论的主要依据是一国发动战争与抵御外敌的水平。帕累托认为，从长远来看，那些具有较高文明的国家会统治那些文明程度较低的国家。通过把政治问题排除在他的理论分析之外，帕累托的战争理论与其说是经济学分析，不如说是社会学分析，这尤其表现在他的“优等社会选择进化规律”上。与瓦尔拉斯不同，帕累托强烈地反对所有形式的国家干预，且认为议会系统对发达社会的军事化趋势负有责任。他认为军费开支是一个浪费，而且是实现最优经济形势的主要障碍之一。

与大部分新古典经济学家忽视战争和防务问题相比，瓦尔拉斯和帕累托是两个例外。二者都把这些与纯经济问题分开，旨在重建完整的社会科学，他们认为在这里，经济学只是其中的一个领域，经济政策问题、应用政治学问题则是同样重要的领域。尽管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没有重建社会科学的理想，但他在某些著作里表现出了对防务与安全问题的关注。而弗朗西斯·埃奇沃思则认为他完全可以用微观经济学方法分析国际冲突。

在《数学心理学》一书中，埃奇沃思阐述了战争与私人契约经济的联系，以此表明了他对战争的认识。他把市场经济和国际关系中的战略互动相比较，从而启发理查德森日后阐发了首个军备竞赛模型。埃奇沃思指出，“经济计算”方



法还可以用于研究有关权力的政治斗争以及与财富有关的贸易斗争。但我们也必须把应用于贸易交易研究的“经济计算”和应用于政治关系研究的“经济计算”分开考虑。两者的利害关系确实不同，前者是财富，后者是权力。克里斯汀·施密特认为，埃奇沃思战争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仍把权力看成“经济品”。我们可以把交战双方的关系看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遵循一样的竞争规则。但是两种关系中的“偏好”不同，“经济计算”的标准也不同。所以按照施密特的观点，“这两大差别的存在说明，埃奇沃思计划把企业间冲突的模型一般化，从而建立战争理论的想法并不可行”。埃奇沃思后来也承认上述理论方法存在问题。他指出，经济学家们必须证明每个民族国家在战争中都将一无所获，从而说服各国不再诉诸战争。

两次世界大战相对削弱了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这是因为这些理论把冲突问题排除在政治经济学之外，因此不能解释这些战争。而相反，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帝国主义论能够很好地解释新的政治、经济危机。这也促使当时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开始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他们研究的主题是如何改进战时与平时的市场体系功能，以确保其能维持下去。二战前后确实出现了大量与正统新古典研究有所区别的非正统色彩的战争经济研究。桑巴特、维布伦和熊彼特等经济学家就另辟蹊径，试图从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特征中寻找战争的原因，这是经济学家在历史上首次分析战时和战后的经济管理。他们研究的主题是如何通过尽力组织战时经济来拯救市场经济，为战争胜利提供物质保障并避免战后经济危机。

熊彼特启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经济中战争的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42）一书中，熊彼特面临着的难题是如何把战争纳入到对经济结构历史演化的解释中。基于社会科学基础，熊彼特的著作对解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战争贡献突出。熊彼特关注资本主义的演化特征。在其研究中，战争与革命都被理解为塑造了经济行为条件的社会与自然结构不断变化的组成部分。认为战争可以为产业革命创造条件，但不是这一变化过程的主要原因。与其理论主体相一致，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成功源于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的作用，而不是政府的干预，战争等特殊情况只对经济发展起次要作用。

战争、和平和国防问题在凡勃伦著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凡勃伦所著的《德意志帝国和产业革命》（1915）和《对和平本质及其长期存在条件的调查》都与此有关。他以制度方法证明了经济民族主义在现代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强



调了在维系世界和平方面封建王朝国家和现代国家之间的重大差别。凡勃伦对战争、和平以及国防问题做了大量研究工作，遗憾的是这些贡献却由于在科学上不够严谨而常常被人们所忽视。凡勃伦的研究综合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法律等领域的思想，具有跨学科特征。尽管他没有建立一般化的理论体系，但他的制度主义分析却提供了正统经济学之外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另一种选择。凡勃伦认为制度影响个人思维的方式和习惯，从而决定社会的发展。他认为，社会发展总是由掠夺和剥削决定的。人类的关系以暴力和掠夺本能为特征。依据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他认为战争清除了最弱小无力的制度并促进了社会的选择过程。战争经常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因为政府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可以采取各种经济、政治措施并无碍于国际贸易。事实上，战争与贸易互相影响；另外，贸易关系的发展并没有保证国际和平，也没有责任去保证。

凯恩斯对两次世界大战起因、结果的经济研究推动了经济理论的创新，也推动了关于战争、和平与国防经济研究的创新。凯恩斯 1919 年出版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和两次大战之间的大量文献都显示出，他有兴趣从国家和国际安全视角研究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的意义。在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中，战争和安全问题占有重要的地位。经济危机使他意识到一些经济政策可以消除市场短期过剩的负面影响，从而改变历史的进程。除了这些理论观点，凯恩斯还详述了政府的实际责任，从而超越了“和平-自由主义”和“战争-保护主义”的简单争论。凯恩斯指出，政治领导人必须同时处理几个不同的、甚至有时还相互矛盾的目标；除了需要短期措施来处理的经济危机之外，还有道德危机。道德危机需要政府考虑这些短期措施对国际关系的长期影响。国际冲突迫在眉睫表明，民主国家应当联合起来以保卫自己的社会制度。在国家经济利益与国际团结之间，凯恩斯从创新视角研究了安全与经济的紧密联系，驳斥了经济自由主义可以实现国际和平的观点。他指责说，寻求最优的国际分工和更广泛的资本出路导致了某些国家的侵略政策，而这些政策意在保护特殊利益、占领新市场和加强经济帝国主义。

当二战不可避免时，凯恩斯开始研究在不损害英国经济的前提下寻求战时融资的最佳方式。在 1940 年出版的《如何筹措战费》中，他运用其 1936 年所出《通论》中的原理来表述这一主题。凯恩斯认为，在冲突带来了经济重建的背景下，政府有必要采取公共措施抑制通货膨胀。凯恩斯建议在社会各阶级之间平等分配战费负担，以维护正义和社会稳定。主张对经济重建活动产生的大量个人储蓄，一半应通过税收杠杆集中起来，以用于战争。他认为战时政府和企业联合组



织（辛迪加）应达成协议，通过出台延期支付等政策措施，通过限制购买力等来抑制战时通货膨胀。我们可以认为，凯恩斯以原创的方式为国防和安全经济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并不研究资本主义的内在冲突特征，而是着眼于改善资本主义并不完美的运行情况，因此他放弃了“看不见的手”这一传统认识。在这种情况下，他拓展了国防和安全的含义：从那时开始，国防和安全不仅关乎战争与战备，而且关乎经济安全。在他的笔下，国防部门只不过是特殊的生产部门，而国防部门也可变成政府实现其经济政策目标的工具。因此，国防与经济的等级关系有时可至少部分地颠倒过来。他也认为，经济亦可变为国防的工具，尽管凯恩斯反对“贸易战”，但他支持经济制裁，尤其是当经济制裁作为威慑手段来使用时。

这一时期，两次世界大战对经济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催生了大量的战争经济学研究。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通常反对经济干预主义，不过他们承认战争时期可以暂时放弃自由主义原则，而一旦战事结束必须恢复到正常的经济状态。

也许是其杰出的福利经济学贡献，在经济学说史上，庇古在战争经济学研究上的贡献却常常被埋没。但庇古在 20 世纪相继出版的《战争的经济和金融》（1916）、《资本杠杆和战争福利杠杆》（1920）、《战争的政治经济学》（1921）奠定了他在战争与和平经济学研究上无可争辩的地位。庇古认为，一战赋予经济学家研究战时经济的责任，而战时经济与平时经济完全不同。庇古并不认同战争因不断增加的成本而逐渐消失的观点，在他看来，战争部分由非理性原因引发，特别是控制其他国家的欲望。因此，国防应予以优先考虑，军事开支应被认为是有益于经济的，因为它是对财富的“保险”。庇古并不相信自由市场经济会自动带来最优的结果。他主张在战争期间，经济学家的目标应该是最大化战争资金，而非经济繁荣。劳动力的参与率可以高于和平时期，而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同样如此。庇古还区分了战争经济成本和战争总成本。在和平时期，经济繁荣不能代表整体繁荣，而只能代表可以用货币衡量的部分；而在战争时期，总成本远远大于其货币估值，因为部分战争成本是道德领域的。

在《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中，庇古指出，战争期间政府必须取代市场以控制关键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政府因此直接干预关键经济部门并运营企业。企业应在议价的基础上得到政府补偿。这种干预产生重要的经济效益，并把价格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上，以防止生产者过度提价而导致的信用和货币供给增加，以及国债的增加。政府也可以采取其他形式的干预措施，如许可证制度、债券以及购



物券，以防止政府和个人对这些商品的需求竞争。主张政府应通过宣传和爱国主义教育等形式鼓励国民减少消费。认为战费开支单纯依靠税收是不够的，因此必须从其他渠道融资；政府间贷款必不可少，因为增加税收会拖垮经济。为了吸引贷款者，政府必须采取多样化可行的投资组合选择，冻结个人其他的投资渠道，限制资本外流都是重要的。但主张政府应尽量避免向银行借款，因为这样做会导致通货膨胀。主张由高收入社会群体负担国债，同时向贫困阶层征税以偿还国债利息。这种有害的影响可在重获平时通过资本杠杆予以消除，此举可使政府迅速还清债务。这样的税收作为例外情况也可带来收入的重新分配，这一收入分配有利于缺乏资本的贫穷阶层，同时也促使国家迅速提升就业、储蓄和生产水平。

新古典时代其他许多的经济学家也研究了战争融资问题，如与庇古一样，威克塞尔（1919）认为战争引起的货币问题很重要。只有尽快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在战后恢复正常的经济活动。他提出解决战争所引起的通货膨胀的最佳途径是降低民众的购买力，并通过战争税和高利率的国内贷款，同比例地提高政府的购买力。另一个解决途径是政府增加货币发行，以形成战时必需的购买力水平。价格上升会使资产所有者和商人获益，他们会同意向政府贷款。但是，威克塞尔谴责这种做法有失公正。因为战争结束后，普通大众必须以交税的方式来偿还政府的贷款和利息。他认为战后通货膨胀是金本位制度运行不良造成的，源于参战国的过度纸币发行。他建议在未来减少货币发行，以保持价格稳定。

庇古和威克塞尔对战争融资问题的研究表明，当时的经济学家希望尽可能地限制战争融资的后果，以保证战后恢复到正常的经济状况。但是，对战争经济的思考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政策观念。二战期间政府干预的增加如此重要，以至于从此后再试图重新完全回到自由放任政策已经不可能了。

四

随着建模技术、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与应用，学者们运用这些数学工具对军备竞赛、军费开支、裁军、经济战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分析。国防经济学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因此成为独立的学科。这些发展至少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以理查德森等的军备竞赛模型为开端，在国际冲突背景下强调经济、政治和战略变量相互依赖的研究大量涌现。军备竞赛是动态的相互作用过程，是两



个或多个国家（国家联盟）源于目标冲突或相互畏惧的武器质量、数量竞争的升级。理查德森创建了第一个军备竞赛模型：在冷战的特殊背景下，该模型开辟了经济学研究防务与和平问题的新路径。尽管许多军备竞赛研究都含蓄地以华约与北约的竞争为参照，但这些模型并不包含有关经济组织类型的变量（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更一般地说，军备竞赛模型还可以用来解释诸如游击战、地区冲突和国际裁军等现象。

理查德森模型试图说明，武器存量意味着寻求战略均衡，但没有促进和平的作用。他并不试图预测战争爆发的时刻，而是警告人们，军备竞赛源自其本质和巴普洛夫式的决定性策略而显示出的“反社会”特征。理查德森运用两个简单的方程式描述了两个国家的军备竞赛过程。其中，根据参数值的不同，军备竞赛有可能或没有可能发展为公开的冲突。该模型的解释能力值得重视，因为它同时包括了国家在决定国防预算时的政治、战略和经济约束。

英特里盖特用四个象限的图表来说明了军备竞赛模型方程，通过该图，我们可以同时看出卷入军备竞赛的国家所面临的战略和经济问题。最优化方法的使用使人们把军备竞赛视为国家理性行为的结果。既然相同的结果可以通过其它“低成本”方法获得，在多种选择中，国家为什么并在何种条件下会选择冲突呢？解决该问题意味着对国家行为的战略考虑，即通过使用垄断理论和博弈论等数学技巧。经济变量并不是冲突的决定性解释变量，只是作为经济约束出现，或是作为人们偏好消费而非安全的表现。此外，军备竞赛分析可用来揭示裁军或军控过程产生的利益。然而，尽管出自经济学家之手，这些模型鉴于战略分析的“好处”都倾向于忽视经济考量。在大多数“战略”军备竞赛模型中，经济只是次要因素。

布里托和英特里盖特（1995）研究了军备竞赛导致战争的条件。他们的研究首先是战略性的，尤其是采用了经济学方法论。其对双头垄断理论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军备竞赛战略分析的层次。首个模型是英特里盖特（1975）建立的，该模型之基础是布里托（1972）关于资源在军用与民用支出之间最优分配的研究。英特里盖特（1975）对两个超级大国（或联盟）之间的军备竞赛进行建模，双方的武器由核导弹存量决定且是国家战略的决定因素。之后，布里托和英特里盖特对最初的模型进行了大量改进。1995年，他们将不对称信息理论、离散时间理论的一些要素引入模型，研究了广受关注的核扩散问题。两位研究者的目标是创建一个模型，以确定核军备竞赛引发战争的条件，或是相反，如何通